

述吐火罗语在证明汉语—印欧语关系中的作用*

李 艳¹ 李葆嘉²

¹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²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提要 汉语与印欧语的关系,无论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一直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界所关注。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对考证古代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由于吐火罗文的年代太晚,现存资料无法直接证明汉藏语和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但是汉语中的吐火罗族称、地名等残留词,以及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为汉语和印欧语在上古时期有过紧密接触提供了确凿证据,也为进一步思考与探寻远古东亚语言和原始高加索语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定参考。

关键词 汉语—印欧语关系 吐火罗语 残留词 借源词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1)06-0586-07

1 引言

汉语与印欧语关系的探索,最早可追溯到北欧学者 Rudbeck(1717),他发现汉语与哥特语存在某些相似性。此后,Edkins(1871)等学者都认为汉语与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德国华裔学者 Chang(1988)论证了汉语与日尔曼语的远古亲缘关系。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周及徐(2001,2002,2003)、谈济民(2001)以及在爱沙尼亚的高晶一(2008)也涉足了这一领域。

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发现上古汉语(原始汉藏语)与印欧语之间存在几百对的对应词(包括基本词汇和词族),特别是上古汉语与原始日尔曼语关系密切,此外还有史前考古文化学、史前人口迁徙和历史文献学的一些关键证据,这为汉语与印欧语亲缘关系假说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可以上溯到距今10000年),不可能有直接语言材料,其过程轨迹还相当模糊,需要继续挖掘和发现新的证据,包括考古文化学、人种基因学、文献语言等方面的证据。其中,如果能够有一些中间环节的可靠证据,无疑对这一假说的探讨非常有益。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学者在西域发现了一些陌生的印欧语写本,其中在新疆西南角于阗等地发现的写本能够确定为伊朗语,但在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的库车、焉耆一带发现的写本,则是一种特殊的古印欧语。经考释,德国学者 Sieg等(1931)将这种古印欧语划分为吐火罗语A(焉耆语)和吐火罗

[收稿日期] 2010年9月6日 [定稿日期] 2011年10月2日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0XJA740002)、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0SZYB07)、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09SZD04)的资助,谨此致谢。感谢《语言科学》匿名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语 B(龟兹语)。后来,英国学者 Burrow(1935)指出在鄯善发现的写本,应称为吐火罗语 C。这些写本使用的是婆罗米笈多(Gupta)斜体字母,为 6—8 世纪的遗物。

尽管 Pulleyblank(1966)曾试图通过吐火罗语证明汉语与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但是吐火罗文的年代太晚,无法直接证明汉藏语与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通过汉语中的吐火罗族称、地名等残留词,以及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却可以为汉语与印欧语在上古时期有过紧密的接触提供确凿证据,也为进一步思考与探寻远古东亚语言与原始高加索语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定参考。

2 吐火罗文明和吐火罗语言

先秦两汉时期,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吐火罗,在汉语文献中被称为“禺氏”(《逸周书·王会解》)、“禺知”(《穆天子传》)、“月氏”(《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 2 世纪,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被称为“大月氏”的一部西迁,先是占领粟特(Sogdiana),然后越过阿姆河征服巴克特里亚(Bactria,即大夏),建立了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1—5 世纪)。

这部分“大月氏”,印度人、粟特人、波斯人则用另一个名称,即“吐火罗”(Toxār)来称呼他们,在梵语佛典中写为 Tukhāra。而巴克特里亚也被称为“吐火罗斯坦”(Toxāristān)。在古希腊学者 Strabo(前 1 世纪)的《地理学》中,吐火罗记为 Tocharoi。自 4 世纪始,西方文献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 Tocharistan。与之同期,自东晋(316—420)时起,中国文献亦称该地为“兜哒罗、吐呼罗、吐豁罗、睹货逻”等,这些都是 Tocharoi/Tukhāra 的异译。在北朝《魏书·西域传》,以及《隋书》、《唐书》的《西域传》中都有《吐火罗国传》。

Mallory(1989)认为,原始吐火罗文明也许就兴盛于公元前 30 世纪,出现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叶尼塞米努辛斯克盆地(Minusinsk Basin)的阿凡纳谢沃(Afanasievo)文化。大约在公元前 20 世纪初,当欧库尼沃文化(Okunevo)取代阿凡纳谢沃文化之时,吐火罗人迁移到塔里木盆地一带,与新疆出土的欧罗巴人种的木乃伊的年代(公元前 2000 年)相吻合。

早期印欧人,主要是吐火罗人抵达新疆之后,一直向东拓展。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他们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甚至进入中原地区。吐火罗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开启了东亚地区金属时代的到来。在史前和上古时期,吐火罗就与中原华夏有着密切的交往。在 10 世纪以后,随着突厥和蒙古的崛起,生活在中国西北新疆的吐火罗人开始逐步融入到当地其他民族中去。

作为一支特殊的古印欧语,吐火罗语与临近的印度—伊朗语言差别很大。Adams(1984)运用统计方法研究发现,与吐火罗语最接近的是日耳曼语,其次为希腊语、印度语、斯拉夫语和拉丁语。

吐火罗语的元音包括单元音和复元音。辅音有喉音、腭音、顶音、齿音、唇音、半元音,以及流音、擦音、声门音和塞擦音。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印欧语言的辅音都存在清、浊配对,而吐火罗语的辅音却并非如此,如没有与 p, t, k 相对的三个浊音(Lane et al. 1938)。吐火罗语的名词、形容词等有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性范畴;数范畴有单数、对数、双数、复数、多数五种。吐火罗语的格范畴形态分为两个层面,下层格是基础格,包括主格、间接格、所有格和呼格,上层格是派生格,包括具格、越格、随格、向格、从格、依格等。吐火罗语在动词变位方面,有基础动词和致使动词。语态有主动态与中动态两种。时态有现在时、未完成时、加重过去时和过去时四种。语气有虚拟、愿望和命令三种。(转引自季羨林 1989)

在词汇方面,吐火罗语多与希腊语、拉丁语等相同,更接近于西部欧洲人使用的西部印欧语。表“100”的形式是 kānt, kante,与拉丁语 centum 的起首辅音 k 相同,而与东部印欧语,如梵语 śatam、立陶宛语 šimtas 的起首辅音 š 形成区别。吐火罗语保留了一些印欧语的古老词汇。如:1)火,焉耆语 por,

龟兹语 puwar, 希腊语 pyr, 试比较汉语的“火”(上古汉语 *hmijʔ, 汉藏语 *mey); 2) 狗, 焉耆—龟兹语 ku, 希腊语 kyōn, 试比较汉语的“犬”(中古汉语 khwien, 上古汉语 *kh^win, 汉藏语 <*kwəy); 3) 大地, 焉耆语 tkam, 龟兹语 kem, 赫梯语 tekan, 希腊 chthōn, 试比较汉语的“土”(上古汉语 *tha)、“坎”(古汉语 *kam;《周易》以坎属水,水就下处卑下之地)。

3 汉语中的吐火罗语遗留词

所谓汉语中的吐火罗语残留词,即该地区当时的居民是吐火罗人,通行的是吐火罗语,一些吐火罗词语由此通过汉字记音方式出现在汉语文献中。吐火罗人曾经生活在河西走廊和新疆一带,用汉字记音的吐火罗人族称、地名,与其他语言中所记录的吐火罗语词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3.1 “祁连” *gi-līen、“祈罗漫”与 klyomo

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的南部边缘, Pulleyblank(1966)将“祁连”的古汉语形式构拟为 *gi-līen 或 *giəy-līen(天堂)。在已知的吐火罗语词汇中并没有这个表“天堂”的词, Pulleyblank 寻找的相关线索有, 焉耆语 klyom, 龟兹语 klyomo(神圣的、光荣的)。其早期形式 *kilyomont, 与梵语 kalyāna(高贵、善良)、希腊语 kalós/kalón(美德、荣誉)等对应。

美国汉学家 Mair(1991:932)发现,拉丁语的 Caelum(天空、天堂)和汉语的“祁连” *gi-līen 音近义同,他由此认为,汉语的“祁连”应译自与拉丁语 Caelum 同源的某个吐火罗语的词(林梅村,1994)。那么,古汉语的 /g/ 对应吐火罗语的 /k/, 吐火罗语的 /k/ 则对应拉丁语的 /c/。

汉文史籍记载,吐火罗人称“天山”为“祈罗漫山、初罗漫山、折罗漫山”。林梅村(1994)认为,这些译名来自焉耆语 klyom 或龟兹语 klyomo。巧合的是,“祁连”的唐代译名为“祈罗漫、析罗漫”,与之相互验证。先秦时代,祁连山被称为“昆仑”。“昆仑”应是吐火罗语 *kilyom(o) 的最早汉语记音词。大概受 *kilyom(o) 中 /l/ 的影响,该词第一个音节 ki- 读成 ki- /kin-, 所以汉字记音为“昆”。

3.2 “敦煌” dwən-”wang 与 δrω”n、drumga

汉代在河西地区,设立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其中张掖、武威、敦煌都是吐火罗语的汉字记音。

作为地名,“敦煌”(dwən-”wang, twən-”wang)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的。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语信札(313)里的“敦煌”名,写作 δrω”n 或 δrω’n。古罗马的地理学家 C. Ptolemaeus(90—168)在《地理学导言》(约 158 年)第六卷记载的中国西北部地名 Θpoava,可能就是“敦煌”。吐火罗语的“敦煌”,匈牙利伊朗学家 Harmatta(1979)认为来自伊朗语的 *Θruvan(宏大建筑,城堡);英国伊朗学家 Bailey(1979)主张来自伊朗语的 *druvān(围绕、坚固之地,城堡)。近些年来,美国汉学家 Mair(1991:932)有提出,“敦煌”(*Twaη-waη, 高本汉 *twər-xwəŋ)来自佉卢文俗语(Kharosthi-Prakrit)的 drumga,可以上推到原始印欧语的 *Dher(稳固)。

《水经注》里地名“敦薨”(twən-hwəŋ),既指焉耆北部的山,又指贝加尔湖。(Pulleyblank,1966)与“敦煌”不同,“敦薨”的第二个音节“薨”的首辅音是清送气音 h,元音是央化的“ə”敦煌、“敦薨”可能是同源词。

“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在敦煌粟特文书上多次发现的 γβω,一般认为就是“昭武”,意为“城主”,用来称呼首领(赵超 1986)。月氏人占领河西走廊后,在张掖建立昭武,作为月氏的都城。“昭武”

与“张掖”在吐火罗语中也都指“王郡”。大月氏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

“武威”的原名是“姑臧”(*kuzan)。“姑臧”与“高昌”(维吾尔语 Qara-hoja,在西域外族语言文献中,高昌的名字长期是 Cinackand 及其变体,意为“秦城”,即中国城)同源,都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高昌的原居民车师人,与楼兰、龟兹、焉耆等地的居民都为吐火罗人(Pulleyblank 1966)。

3.3 “月氏”*ngiwāt-tiē(g)与 gwat-t'i

吐火罗人与中原的早期接触,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吐火罗人的称呼中也反映出来。据荀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三》,月氏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河西走廊敦煌、祁连山之间的游牧民族。据《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印度学者 Narain(1990:174—175)认为,月氏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公元前2世纪,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被称为大月氏的一部西迁,先是占领粟特,然后越过阿姆河征服巴克特里亚,建立了贵霜帝国(1世纪至5世纪)。从此,西迁的被称为大月氏,留在河西及西域一带者统称小月氏。月氏在河西走廊游牧时尚无文字,因此他们的早期语言只能在历史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

作为吐火罗语的“月氏”,可与龟兹语的 yatikor、焉耆语的 watku(统率、管辖)比较。高本汉(1957:134)构拟的“月氏”上古音*ngiwāt-tiē(g)。公元前2世纪,第一个音节的形式应是 gwat 或 gut,第二个音节里的-g尾已经脱落。“月氏”的整个名称是 gwat-t'i 或 gut-t'i。亨宁(1992)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高本汉假定的外语形式有 gwat-ti/gwot-ti, gat-ti/got-ti 或 gut-ti(转引自亨宁 1992)。亨宁(1992)推测“月氏”上古音为*ngiūt-tiē(g)。亨宁统计了4世纪以后文献中出现的“月氏”词形,解释了*Gu(t)-ti如何演变为 Yüē-chih 的过程。

从河西走廊的“姑臧”(*kuzan)到西域的“车师”(*kushi),到“龟兹(kuci)、库车(kucha)、曲先(kusan)”,乃至远达中亚费尔干的古都“贵山”(kusan),再到贵霜帝国,这些地名的发音与“月氏”的古音*kushi/*kusi/*kuti(在新巴比伦和新亚述时期,由于词首清音的强化,“古提”大多被读成 kuti,而非 Guti,参见加姆克列利则等,1998)都很相似(耿世民 2004)。

Pulleyblank(1966)指出,月氏的一些部落名和头衔是吐火罗语词。公元前108年,小月氏首领“若苴”臣服于中国。在汉代,汉语的塞擦齿音常用来记录外族的腭音。由此,“若苴”*nyak-tsia 就可与焉耆语ñkāt、龟兹语ñakte“神”的派生ñakci,ñake(i)ye(神的)进行比较。而焉耆语ñkāt、龟兹ñakte(神),可能与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 wa-na-ka、荷马时代希腊语的(w)anax(国王,圣王)同源(加姆克列利则等,1998)。

此外,乌孙曾是月氏东边的邻国。《汉书·西域传》记载,春秋时乌孙占据着整个河西走廊。据《汉书·张骞传》,月氏人要到此定居,将乌孙王难兜靡斩杀于马下。乌孙人只得抱着尚在襁褓中的王子驹靡投靠匈奴。“乌孙”之名,见于汉武帝时期,在此之前自号为“昆”。《史记》、《汉书》记载,乌孙王号“昆靡”或“昆弥、昆莫”。乌孙王的名字后面都附缀“靡”(*miað),如“难兜靡、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元贵靡”等,可能源于焉耆语的 wāl 或龟兹语的 walo(国王)。地处新疆的“昭苏”为乌孙西迁后所建乌孙国之故地,自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起,统属西域都护府。“昭苏”与“昭武”同源,意为“城主、首领”。

3.4 “龟兹”ku-či 与 kúsi

“龟兹”最早见于班固《汉书》:“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酏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在龟兹文中,“龟兹”为 kúsi,生格为 kúsin。吐火罗语中常

见的硬腭化现象: $t' > c$, 在方言中存在 $\check{c} > \bar{s}$, 也反映在龟兹语的自称 $ku\check{c}a\bar{n}\bar{n}e$ “龟兹人”及形容词 $ku\bar{s}i\bar{n}\bar{n}e$ “龟兹的”中。“龟兹”的梵文 $ku\check{c}i$ 、古汉语 * $ku\check{c}i$ 、古突厥语 $k\bar{u}s\bar{u}s\bar{n}\bar{n}\bar{a}\bar{n}$ ($k\bar{u}\bar{a}$)、古回鹘文 $kwy\check{c}$, 这些词形都可为相应音变作佐证。(加姆克列利则等, 1998) 上文提及河西走廊的“姑臧” * $kuzan$ 与西域的“高昌”同源。高昌的原居民车师人, 与龟兹、焉耆、楼兰等地的人都为吐火罗人。其中, “车师”的上古汉语为 * $k\bar{i}o-s\bar{j}i(r)$, Henning (1992) 构拟为 * $k\bar{u}ši$ 。“车师”可能是“龟兹”($ku\check{c}i$) 的一种方音。

3.5 “焉耆” $Ien-k'i$ 与 $\bar{a}rki$

在汉语历代文献中, “焉耆”的记音有: 焉支、燕支、烟支、胭脂、胭支、燕脂、烟肢、燃支、焉耆、焉提。“焉支”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 “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 过焉支山千余里, 击匈奴。”“焉支山”是居住在该地的月氏命名的。地处西域的焉耆, 汉唐时有三种写法: 《两汉书》等为“焉耆”, 《佛国记》等为“乌彝”, 《大唐西域记》为“阿耆尼”。

据戴希龙 (2006) 考证, “焉耆”等同于“月氏”, 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焉耆 (绿洲城市) 的古音是 * $argi$ 。Pulleyblank (1966) 认为, 从词源上来看, “焉耆”一名与焉耆语的 $\bar{a}rki$, 龟兹语的 $\bar{a}rkwi$ (白色) 可能有关, 而 $\bar{a}rki$ 、 $\bar{a}rkwi$ 与希腊语的 $\alpha\rho\gamma\acute{o}s$ (闪亮的)、 $\alpha\rho\gamma\upsilon\rho\acute{o}s$ “银色”同源。

加姆克列利则等 (1998) 认为“焉耆” $Ien-k'i$, 与焉耆语的 $\bar{a}r\acute{s}i$ (如 $\bar{a}r\acute{s}i-k\bar{a}\bar{n}twa$ “阿尔西语”; $\bar{a}r\acute{s}i-ype$ “阿尔西国”) 有关。亨宁 (1992) 认为, “焉耆”与伊朗语中的 arg “阿尔格国”一致, 在梵文中是 $agni$, 这些地名都是指“绿洲”。

3.6 “大宛” $d\bar{a}-'iwan$ 与 $taxwar$

“大宛”(汉语中古音 $d\bar{a}-'iwan$) 也是吐火罗在西域建立的国家之一。据《史记·大宛传》载: “大宛在匈奴西南, 在汉正西, 去汉可万里。……其北则康居, 西则大月氏, 西南则大夏, 东北则乌孙, 东则犍弥、于阗。”希腊语有两个形式 $\tau\acute{o}\chi\alpha\rho\acute{o}\iota$ 、 $\tau\acute{\alpha}\chi\alpha\rho\acute{o}\iota$ 与 * $taxwar$ (大宛) 对应。

康居与大宛为邻, 《史记·大宛传》载: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 行国, 与月氏大同俗。”与其他吐火罗游牧民族一样, 早先的康居原在西域东边, 后在匈奴压力下西迁伊朗地境 (Pulleyblank 1966)。西汉时, 康居位于锡尔河的塔什干地区, “康居”上古汉语构拟 * $kh\bar{a}n-k\bar{i}\bar{a}\bar{n}$ 。Bailey (1979) 指出, $kh\bar{a}n$ 可能记录的吐火罗语 $k\bar{a}\bar{n}k$ - (石)。上古汉语文献又称“康居”为“石国”。突厥语称 $tash-kend$ (石城), 即把突厥语的 $tash$ (石) 和借自粟特语的 $k\bar{a}nt$ (城) 结合成词。唐朝时, 康居被称为 $Samarkand$ (康国)。

4 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

所谓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 是指通过文化交流, 吐火罗人借用中原汉语并用吐火罗文记录的词语。总体而言, 吐火罗语受汉语影响较少, 主要表现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比如:

龟兹语 $c\bar{a}k$	汉语“百磅”〔1〕
龟兹语 $c\bar{a}ne$	汉语“钱”
龟兹语 tau	汉语“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常用词汇也来自古汉语。比如: 焉耆语的 ko , 龟兹语的 koy “口”, 与古汉

〔1〕 此语料转引自季羨林 (1998), 原文中没有标出该词的汉语意思, “百磅”为作者后加。

语的 *ko 对应。焉耆语的 ype、龟兹语的 yapoy, 借自古汉语的“邑”。焉耆语的 tsem, 借自古汉语的“青”。龟兹语的 śakse, 借自古汉语的“烧酒”(转引自季羨林 1998:192)。

古汉语里的吐火罗语借源词, 最典型的是“蜜”(mi) < 上古汉语 *miet < 龟兹语 mit(蜂蜜)。该词从公元前 10 世纪后半期起, 在汉语中出现(加姆克列利则等 1998)。此外, 汉语中的一些佛教词语, 季羨林(1998:191)认为借自吐火罗语, 如“沙门”借自焉耆语 cāmam, “须弥”借自焉耆—龟兹语的 Sumer, “弥勒”借自焉耆语 Metrak、龟兹语的 Maitrāk。

关于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 与汉语中的吐火罗语借源词, 研究得还很不充分。这需要吐火罗语专家提供新的成果。根据目前知道的这些证据, 还只能证明汉语和吐火罗语曾经有过紧密接触关系。要想证明汉语—印欧语的亲缘关系, 还得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 尤其是需要更多的可靠材料。

参考文献

- 戴希龙 2006 月氏(Yuèzhī)乎? 月氏(Ròuzhī)乎?——浅论语言的微观变化,《湖南大学学报》第6期,101—108页。
- 高本汉 1957 《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译 1997),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高晶一 2008 《汉语与北欧语言——汉语与乌拉尔语言及印欧语言同源探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耿世民 2004 吐火罗人及其语言,《民族语文》第6期,29—31页。
- 亨宁, W. B. 1992 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徐文堪译注),《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23—24页。
- 季羨林 1989 吐火罗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25—26页。
- 季羨林 1998 吐火罗文研究,载《季羨林全集》第十二卷,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加姆克列利则, T. V. 等 1998 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 吐火罗人在古代中东的祖先(杨继东译, 徐文堪校),《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51—70页。
- 林梅村 1994 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第4期,113—116页。
- 谈济民 2001 《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 赵 超 1986 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文物》第12期,87—89页。
- 周及徐 2002 《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Adams, D. Q. 1984.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4(3): 395—402.
- Baily, H. W. 1979.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row, T. 1935.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 667—675.
- Edkins, J. 1871.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 London: Trübner.
- Harmatta, J. 1979.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75—91,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Lane, G. S. 1938. Problems of Tocharian Phonology. *Language* 14(1): 20—38.
- Mair, V. H. 1991.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Place Name “dunhuang”, 载李铮等编《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卷二), 901—954页,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Mallory, J. P. 1989.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Narain, A. K. 1990. 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 In D. Sinor(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lleyblank, E. 1966.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2): 9-39.
- Rudbeck, O. 1717. *Specimen Usus Linguae Gothicae, Addita Analogia Linguae Gothicae Cum Sinica, Necnon Finnicum Cum Ungarica, Cum Thesauris Linguarum Asiae et Europae*. Uppsala: Joh. Henr. Werner.
- Sieg, E. & Sieging W. 1931. *Tocharische Grammatik*.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Tsung-Tung Chang 1988. Indo-European vocabulary in Old Chinese: A new 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In Mair, V. H. (ed.), *Sino-Platonic Papers* 7, 1-60, Philadelphia [www.sino-platonic.org].

作者简介

李艳,女,1970年生,湖北宜昌人。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比较语言学。

李葆嘉,男,1951年生,江苏东台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兼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亲缘比较语言学。

The Role of Tocharian in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Li Yan¹ Li Baojia²

¹*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²*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of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discovery of Tocharian in Xinjiang from 19th to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helped a lot in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se two. Since Tocharian existed so anciently, it couldn't provide evidence to prov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But the names of tribes and places of Tocharian remained in Chinese and Chinese loanwords in Tocharian offer concrete for the evidence for clos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That also sugg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Proto-Caucasian.

Key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Tocharian remains loanwords